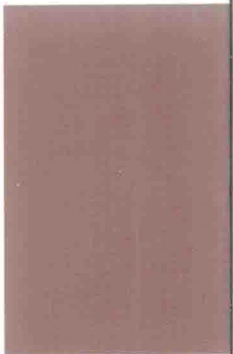


中国近现代 伦理启蒙



徐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 伦理启蒙

徐 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 / 徐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61 - 3976 - 9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伦理学—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69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冯 斌
责任编辑 冯 斌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402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萧昆焘教授、王育殊教授创立，90 年代初开始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构成的年轻的学科梯队，至 90 年代中期，这个团队基本实现了博士化。在学界前辈和各界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自 20 世纪末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团队的同仁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应当和可能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换言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应当形成和建立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很明白，没有特色的学术，其贡献总是有限的。2005 年，我们的伦理学科被批准为“985 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个历史性的跃进推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过认真讨论并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我们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贡献点定位于三个方面：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

以道德哲学为第一建设方向的定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伦理学在一级学科上属于哲学，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须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和足够的哲学含量；当今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必须在道德哲学的层面探讨和解决。道德哲学研究立志并致力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在这个被称为“后哲学”的时代，伦理学研究中这种对哲学的执著、眷念和回归，着实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但我们坚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努力。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

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

基于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设中，我们决定进行系列研究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严肃而审慎地推出以“东大伦理”为标识的学术成果。“东大伦理”取名于两种考虑：这些系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的成员，有的系列也包括东南大学培养的伦理学博士生的优秀博士论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并努力使这些成果具有某种特色，以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东大伦理”由五个系列构成：道德哲学研究系列；科技伦理研究系列；重大应用研究系列；与以上三个结构相关的译著系列；还有以丛刊形式出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的《伦理研究》专辑系列，该丛刊同样围绕三大定位组稿和出版。

“道德哲学系列”的基本结构是“两史一论”。即道德哲学基本理论；中国道德哲学；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不仅在概念上将“伦理”与“道德”相区分，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将伦理学、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相区分。这些区分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但它更深刻地与中国道德哲学传统相契合。在这个被宣布“哲学终结”的时代，深入而细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学研究反倒是必须而稀缺的，虽然那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气象”在中国几乎已经一去不返，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学术已经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气魄。中国道德哲学史、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理念基础，是将道德哲学史当作“哲学的历史”，而不只是道德哲学“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它致力探索和发现中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的精神内涵，并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专门史与通史，将是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纬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辩证法是其灵魂与方法。

“科技伦理系列”的学术风格与“道德哲学系列”相接并一致，它同样包括两个研究结构。第一个研究结构是科技道德哲学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伦理学，而是从哲学的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学”而不是“科技伦理学”；第二个研究结构是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如基因伦理研究、网络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等等。第一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理论建构，第二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问题探讨，由此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互补与互动。

“重大应用系列”以目前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为起步，以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为重点。目前我们正组织四个方面的大调查，即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大调查；道德生活大调查；伦理—道德素质大调查；伦理—道德发展状况及其趋向大调查。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努力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推进和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意义和创新意义的对策思路。这就是我们对“重大应用”的诠释和理解，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贡献出团队和个人的研究成果。

“译著系列”、《伦理研究》丛刊，将围绕以上三个结构展开。我们试图进行的努力是：这两个系列将以学术交流，包括团队成员对国外著名大学、著名学术机构、著名学者的访问，以及高层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为基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主题和主线，由此凝聚自己的资源和努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任务的提出表明完成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也许，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自己难以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条件尤其是我本人和我们这支团队的学术资质方面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我们期图通过漫漫兮求索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以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为三元色的“东大伦理”的学术标识。这个计划所展示的，与其说是某些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为中国伦理学事业贡献自己努力的抱

负和愿望。我们无法预测结果，因为哲人罗素早就告诫，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展望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昭告和承诺的是：

我们正在努力！

我们将永远努力！

樊 浩

谨识于东南大学“舌在谷”

2007年2月11日

目 录

导言	(1)
一 “启蒙”的精神本质	(2)
二 启蒙的“中国问题”	(7)
三 “伦理启蒙”及其内涵	(11)
 第一章 内源性伦理启蒙的理论形态与历史意义	(17)
一 理学伦理模式及其精神桎梏	(17)
二 个体的觉醒	(26)
三 自然主义人性论	(34)
四 “天下”观念中的“民主”因素	(42)
五 早期伦理启蒙余论及其近代回响	(49)
 第二章 “体用”范式下的伦理启蒙	(59)
一 “悉夷”、“师夷”的启蒙伦理意蕴	(61)
二 “中体西用”框架下的伦理心态	(71)
三 “中西本末绝异”的伦理观	(82)
四 “体用”范式下伦理启蒙的深化	(93)
 第三章 “科学”的伦理启蒙	(100)
一 传统儒家伦理与科学	(101)
二 “科学救国”	(111)

三	唯科学主义与“科玄论战”	(122)
四	现代新儒学的科学伦理观	(143)
第四章	民族主义思潮下的伦理嬗变	(154)
一	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伦理维度	(154)
二	“中华民族”观念与传统伦理之转型	(166)
三	政治民族主义与新的伦理核心价值	(175)
四	文化民族主义与传统伦理精神	(184)
第五章	自由:伦理启蒙的基础性理念	(193)
一	自由主义的传入及其伦理内涵	(195)
二	“自由为体”对传统伦理政治的颠覆	(207)
三	从“个性自由”到“公共精神”	(216)
四	“自由”的价值与新义利观	(221)
第六章	文化论争中的伦理启蒙(上)	(231)
一	两种伦理启蒙路向	(232)
二	文化激进主义之伦理启蒙	(237)
三	全盘西化论之得失	(265)
四	“伦理的觉悟”	(272)
第七章	文化论争中的伦理启蒙(下)	(278)
一	文化特性与伦理的价值	(280)
二	昌明国粹 融会新知	(292)
三	“五伦”的价值与“三纲”的精神	(307)
四	文化论争:两种伦理启蒙	(317)
结 语		(332)
一	伦理启蒙与救亡	(332)
二	伦理启蒙的深化:从观念到实践	(336)

三 伦理启蒙的未来之路	(343)
参考文献	(347)
索引	(356)
后记	(370)

导 言

中国近现代思潮汹涌澎湃、此起彼伏，但无论如何，“启蒙”总是无可置疑的主题之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始自 19 世纪中叶，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研究维度的差异，因而对这一思潮的理解也充满了分歧。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启蒙的特殊形态。因为“启蒙”既具有普世的价值追求，又随着不同历史情境而产生不同的表现形态。历史已经证明，启蒙运动的形式复杂而多样，历数意、英、法、德、荷、俄各国的启蒙，其目标、方式、路向皆大相径庭，即使是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样的近邻，启蒙样态也迥然不同，更何况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启蒙必然有其独特的形态。如果说，因为相似的宗教传统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欧洲诸国的启蒙运动既有统一性，又各具特色，表现出启蒙的历史多样性。那么，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语境、问题意识、文化传统则决定了中国的启蒙历程必然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形态。这也是本项研究的重点所在：伦理观念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与“启蒙”产生了“共鸣”——传统伦理的解体与崭新的伦理观念的产生与传播引领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伦理启蒙”构成了中国启蒙思潮的重要主题与核心内容。“伦理启蒙”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型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瓦解了宗法伦理这一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石，唤醒了民族意识，激发了爱国观念，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动力。本研究课题不是全面地梳理关于中国近代启蒙的方方面面，而只是通过一个特定的视角——具有启蒙意义的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来展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规律及其发展历程。

一 “启蒙”的精神本质

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首先是“伦理启蒙”。启蒙虽然具有与西方启蒙相同或相似的本质特征，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伦理启蒙”的必然性。

“启蒙”是一个泛文化概念，它在多重意义上使用。首先，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启蒙”都是一个自古就有的词汇，并且在通常意义上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启蒙”在德语中是“Aufklären”，在法语中是“Luire”，在英语中是“Enlighten”，它们的中心字根皆为“光”、“照亮”，一般意义就是传递知识，使人从无知走向有知。在汉语中，“启蒙”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皇霸六国篇》：“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根据《汉语大词典》，“启蒙”的本义有二：一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二是使初学者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其次，“启蒙运动”确立了“狭义的启蒙”的内涵。“启蒙运动”是近代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从17世纪的法国开始，逐渐席卷整个欧洲，它试图把这个世界从神话、迷信和宗教的绝对权威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一系列观念为西方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我们现在一般称之为“狭义的启蒙”，法语中的 Lumières，德语中的 Aufklärung，英语中的 Enlightenment 等词就是表达了“狭义的启蒙”的含义，它不但表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更代表了被视为启蒙时代的本质特征的理智努力。这一意义上的“启蒙”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的“光源隐喻”相契合：光，喻义为智慧，智慧源于理性，理性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人通过理性之光的引导而从黑暗走向光明，摆脱无知、偏见与盲从。可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启蒙与这种“狭义的启蒙”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在于通过初步教育，使无知者“接受”以往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知识、规范和价值，故这是一种“蒙启”，是对一无所知者灌输固有的知识。而后者恰恰相反，它要怀疑和重新审视那些固有的、习以为常的规范，突破现有的知识和信仰。19世纪末，伴随着西学东渐，汉语中的“启蒙”也被赋予了同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启蒙”相同的意义，与观念进步、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于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启蒙”在中国出现了。我们所要探讨的，即是这一语境下的“启蒙”。

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启蒙”的本质是什么?虽然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要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才出现,但其丰富的内涵却是在近代欧洲历时200多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启蒙时代”)中逐渐形成的,其主题是破除对基督教神权与神学的迷信和盲从。根据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看法,中世纪基督教具有诸多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宗教信仰的权威化、神圣化,其权威力量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无所不在。^①在这样一个神权的社会里,神圣秩序和教条完全统治了人的身心,人生的目标被定位为忠诚于对神的信仰、通过禁欲而求得灵魂的救赎。天主教会依据《圣经》的创世说设定了科学探索的禁区,人的理智仅在于认识神所创造的那种既定的、必然的秩序。所有这一切,不但使人昧于真理,受制于自然的束缚,更因为神学对“君权神授”的维护,使得封建制度具有合法性依据。因此,欧洲启蒙运动的一条主线是反对天主教会和教权主义,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所言,启蒙运动要求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②故法语以 *lumière naturelle* (自然之光) 表达启蒙时代所崇尚的理性,以区别于 *lumière révélée* (神启之光),表示真理是理性所把握的客观规律,而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这是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某种共同特征。

这里的问题是,欧洲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总体”,包含着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其所涉及的内涵既有精神的、体制的,也有伦理的、政治的。所有这些,对不同国家来说,难以用一句话概括,那么,这种基于欧洲历史文化的地缘经验能否引申出普遍意义的“启蒙精神”呢?

抽象地说,启蒙运动开拓了人类的精神空间。这种变化通过对“理性”精神的张扬表现出来,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基于信仰的理性时代”——“理性”成为一种信仰。德国思想家卡西勒(Cassirer Ernst, 1874—1945)在《启蒙哲学》中说:“所有形形色色的精神力量汇聚到了

① [美] 约翰·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张国清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② [英]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一个共同的力量中心。形式的差别和多样性，只是一种同质的形成力量的充分展现。当18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①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基本观点是“理性自主”，这是在所有知识领域都牢固确立的一个概念。但是，“理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分歧极大的概念，人们常常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使用理性一词。就其基本含义来说，理性与科学的合理性或知识相联系，是指理智意义上的、人类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思想、逻辑判断与推理能力等）来把握生活世界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就此而言，“启蒙时代”的理性与其本义相一致。但是，这一时期对理性的张扬的特殊之处在于，理性的使命不仅是获取和扩展知识，也是确立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是认识真理，更是在获得真理的过程中发现理性的真正力量。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启蒙时代之提倡“理性”主要解决的是独立思考的勇气而不是能力。因此，在理解启蒙的精神本质时，了解“启蒙哲学最卓越的代言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关于启蒙的经典定义，对我们是有启迪意义的。1784年，在启蒙运动接近尾声时，康德对这一历时数世纪、跨越全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揭示了“启蒙”的本质。指出了理性对于启蒙的意义：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②

运用理性的自由，就是康德所揭示的跨越时空的，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启蒙”的特质。“启蒙”是人类精神空间的扩展，是一个克服思维定式的过程。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思维定式的人来说，精神活

① [德] 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② [德]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25页。

动超越固有的界限并不简单，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智力能力，而是由于巨大的传统力量禁锢了其精神活动，使其没有勇气运用自己思考的能力。正如康德所指出的，人类的“不成熟状态”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沉湎于既成的思想惯性，这种怯懦与惰性无人引导就不能自觉地摆脱。启蒙的要点在于，“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和“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也就是说，敢于并且能够自由地运用理性是启蒙的条件。如此，才能批判一切不合理的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使人们长期被禁锢的头脑达到历史性的解放。

不仅如此，康德所言之“理性”，并非局限于狭义的智性，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统摄人类全部心灵能力的理性”；前者能够获得知识的无限扩展，后者则更受道德力量的驱使，包含了强烈的价值意蕴。^①“理性”意味着“合理性”，这不仅是认识，亦是价值判断，是评判的灵魂。因此，理性是价值之源。启蒙运动为近现代社会奠定了一系列基础性的价值，如“自由”、“平等”、“人道原则”、“天赋权利”等等。在中世纪，人的一切思想都来自神的启示，而在启蒙时代，则以理性为基础。无论是自然真理，还是伦理原则、立法依据，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总之，康德以深邃的洞察力揭示了理性之于启蒙具有根源性的价值。对此，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康德表达了这样的观念：除了“理性”的权威，思想不服从任何权威，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这种哲学质疑使那些习以为常的历史、现实乃至主体自身均成为问题而受到追问。启蒙不是执著于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为了永久地激活某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②。福柯的看法进一步提升了启蒙的普遍意义。“启蒙运动”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其具体内容必然随各国的历史特点和政治、文化背景而异。而“启蒙”的普遍性在于，它对一切既定制度或观念进行批判性审视，这种审视挑战了既成的秩序，使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受到追问，追问神圣是否神圣，权威何以权威，合理性依据是否合理。随着这种追问的不断延伸，不断扩展的人类精神也不断突破各种界限，获得

① 参见何兆武《再版译序》，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② [法]米歇尔·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顾家琛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

更大的自由空间。

那么,欧洲启蒙运动所针对的思想的禁区、精神的枷锁源于何处?欧洲中世纪的精神束缚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黑暗、民众的蒙昧,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上帝的盲目信仰和对宗教权威的无理性的膜拜,而宗教作为一种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力量,渗透在政治、法律、伦理、艺术等各个领域。宗教所宣称的“天赋观念”规定了精神活动的范围,具有毋庸置疑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而18世纪所崇尚的“理性”,恰恰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把握事物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不是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一种引导人们去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这种能力、力量最重要的功用,就在于它不仅瓦解了人们源自启示、传统和权威而所信仰的一切,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一座崭新的知识大厦。一旦“我思”的力量在人的身上觉醒,并把国家和社会的现存秩序传唤到思想法庭上,向它的真理性和有效性提出挑战,上面所讲的一切便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启蒙以批判宗教神学为理论切入点,所针对的是当时笼罩欧洲的以宗教权威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存在于民众中的愚昧主义。正如康德所说:“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成熟状态,主要地是放在宗教事物方面。”^①因此,所谓的启蒙思想家,即是各个领域突破神学限制的自然科学家、人文主义者。在卢梭那里,人的一切行为不再依靠上帝的安排,良心才是人内心的道德法官。^②在霍布斯那里,宗教源于对未知自然力量的恐惧与敬畏,神被还原为人的想象物。在斯宾诺莎那里,借助语言学的方法,圣经被还原为普通的文本。而在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里,风俗作为人类的生活全景的统称,历史第一次被描写为人自身的历史,而不是“神的意志”支配的历史。伏尔泰以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和风俗发展的“历史哲学”代替了“历史神学”,用一种启蒙的历史观代替了神圣历史的框架,重新诠释了世界历史。^③

① [德]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31页。

② [法] 卢梭:《爱弥尔:论教育》下卷,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1—402页。

③ [美] 詹姆斯·施密特(J. Schmidt)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360页。

“启蒙”始于对真理神启的怀疑，终于对神学权威的颠覆和人的自我解放。依靠理性所确立的价值观念——生存以人为本而不是为了荣耀上帝，尊重法律而不是宗教评判，天赋人权而非君权神授，追寻自然规律而反对世界神创，等等，西方国家在此基础上，以理性的方式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性价值理念：天赋权利（自然权利）、自由、平等、人道原则等等。从这一意义来说，启蒙运动是“人的觉醒”的过程，是挣脱、排除一切宗教的、意识形态上的束缚的过程。当然，其具体内容必然会随着各国的社会结构、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而有所差异。也就是说，一切旨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对既成制度或各种观念的批判性思考，以及所有促进上述价值实现的思想，都应当被纳入启蒙的范畴。

二 启蒙的“中国问题”

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是以批判神学的形式而展开的，那么，推动中国近代启蒙的“中国问题”是什么呢？应当说，启蒙在18世纪的欧洲和19世纪的中国在理论思维和实践路径上各有其不同的特点。虽然在终极意义上，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具有一致性：启蒙的使命——以理性精神启迪民智，以自由民主精神反对封建专制——这在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是基本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任务。然而，中国发生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与欧洲迥然不同，当西方国家进入近代时，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的稳固体制内。中国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摆脱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被迫开始了自己的启蒙历程。这种情况与18世纪的欧洲是不同的。中国的启蒙因形势紧迫而迅速启动，所以思想准备并不充分，对基本理论未能作深入的思考，一开始就进入了有着明确功利目标的“实践”层面。历史没有给中国一个宽松的环境、没有给知识精英一个从容的心态去思考启蒙的学理。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只能关注那些对社会现实会产生直接作用的思想观念。这意味着，从直接目标而言，中国的启蒙自有其特殊的问题意识与时代语境。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启蒙与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相关。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由哲学家展开的学理层面的探究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启蒙运动的种种理念一直在哲理层面被反复地思考，进行充分的辩论。漫长的思想酝